

昭质堂本《樊川文集》考论

叶 帮 义

《樊川文集》常见的版本有日本枫山官库藏宋刊本(景苏园影印)、明翻宋刊本(《四部丛刊》影印)和四库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明刊本为底本,参校宋刊本等,点校出版了《樊川文集》,成为今之通行本。近几年又有学者关注到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以下简称朝鲜夹注本),但这个本子仅有诗歌(且无“别集”部分),虽对阅读通行本《樊川文集》有参考价值,但仍有欠缺。笔者翻阅昭质堂刻本《樊川文集》,发现其中不仅有诗,而且有文,对通行本《樊川文集》有较多的补充。但这个本子只有南京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和福建师大图书馆收藏^①,故很少有人关注,《唐集叙录》、《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等书均未著录。今特加以评介,希望对学界研究杜牧诗文和整理《樊川文集》有参考价值。

一、昭质堂本《樊川文集》的体例

昭质堂本《樊川文集》二十二卷,包括本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有明人张巽申(洁修)序跋、郑邴(復止)的评语。据张序可知,该本刊于崇祯壬午(1642)。

昭质堂本《樊川文集》在体例上与通行本相比,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点。就一致的地方而言,二者都是二十二卷,包括本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本集前三卷为诗赋部分,其余为文,外集和别集均为诗歌。但昭质堂本在作品的编排上有自己的特色,即注重体裁的划分。不仅本集中区分诗、文,在诗文内部也注重体裁的细分,即本集和外集、别集中的诗歌均按照体裁重新编排顺序。观其凡例和目录可知。

^①此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唐五代别集》介绍。另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也有收藏,但不全。福建师大收藏的本子也不够全。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本子因为近期处于搬迁状态,笔者未能寓目。本文所依据的是湖南省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和安徽师大图书馆三家收藏的本子。

《凡例·本意》曰：“本集裴延翰编二十卷，今仍其旧，但类次多紊，略加次序，各标体制，未敢去取。”《凡例·分体》曰：“本集诗体混列，未便观览。今五七言、古今体，分别类从，庶不淆乱。外集及别集亦如之。”

《樊川文集目录》包括：卷一（赋三首，诗十五首，诗均为五古）；卷二（诗三十一首，均为五古）；卷三（诗五十九首，包括七古、五律、五排）；卷四（诗七十六首，包括七律、五绝、六言诗）；卷五（诗八十八首，均为七绝）；卷六（杂著五篇）；卷七（杂著七篇）；卷八（序四篇、记六篇）；卷九（书七篇）；卷十（书九篇）；卷十一（表九篇，状十四篇）；卷十二（启十三篇）；卷十三（制廿篇）；卷十四（制廿二篇）；卷十五（制廿七篇）；卷十六（制廿九篇）；卷十七（祭文七篇、行状二篇）；卷十八（志铭三篇）；卷十九（志铭四篇）；卷二十（志铭八篇）；外集（诗九十三首）；别集（诗五十二首）。

虽然通行本也是按照体裁来编排的，但不及昭质堂本区分得细致。如通行本《樊川文集》本集中的诗歌部分，只是大致区分为古体诗和律诗，而昭质堂本不仅将古体诗分为五古、七古，也把律诗分为五律、七律、排律、五绝、七绝诸体。这种分体，自然使得同一作品在卷中的位置不同于通行本，彼此相关的作品如组诗、同时之作也因为体裁不同而被分置各卷之中，有些作品的题目甚至因此被改动，如《送国棋王逢》和《重送绝句》因为是送别同一个人，在通行本中一并列于本集卷二。而在昭质堂本中，前首作为七律列于卷四，后首作为七绝列于卷五，因为后首未与《送国棋王逢》前后相继，或恐读者不明作品中的人事，故改题为《重送国棋王逢》。又如《和野人殷潜之筹笔驿十四韵》和《重题绝句一首》，在通行本中一并列于本集卷四。而在昭质堂本中前者作为五古列于卷二，后者作为五绝列于卷四，因为后者未与《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前后相继，担心读者不明作品中的地点，故改题为《重题筹笔驿》。这种重排，固然有利于读者从体裁上对杜牧的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但也对裴延翰本的旧貌有一定的改动。

还有些诗歌在本集、外集、别集的位置与通行本不同。如《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在通行本中列于本集卷三，在昭质堂本中列于外集；《送张判官归兼谒鄂州大夫》在通行本中属于外集，在昭质堂本中列于本集卷二；《书怀寄卢州》在通行本中属于外集，在昭质堂本中列于本集卷三。另外，在收录的诗歌数量方面，昭质堂本也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如本集收诗数量在通行本中为258首，昭质堂为269首；外集收诗数量在通行本中为124首，昭质堂本为93首；别集收诗数量在通行本中为60首，昭质堂本为52首。这可能是昭质主人依据的版本不同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有昭质主人自己的取舍。凡此皆说明凡例所谓“今仍其旧”，其实只是卷数未动，其他方面则可能多有改动。

二、对昭质主人（昭质堂的主人）的初步考察

该本凡例署名为“昭质主人”，板心又有“昭质堂”的字样。但昭质堂是什么时候的？昭质主人是谁？书中并未加以说明，查阅《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室名别号索引》、《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诸书，亦不见收录。笔者根据书中提供的一些信息，做一初步探讨。

首先是书中张巽申为该本所作的序。为便于考察，现移录于下（括号内打问号的字，因为原文属于手写体，不易辨认，故存疑）：

序郑復止评樊川集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子舆所（？）言，开千古尚友人生面。夫知其人，而诗书不为陈牍，颂读不为呶唔，恕先在焉，呼之或出。善颂读者，当作是观。嗟乎，人固难知，知人亦不易也。不知其人而思之拊髀，失之交臂，掩卷但有生不同时之叹。即文在兹，而作者之神情与述者之向往，漠焉河汉安所取？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而颂之读之，侈经生穷年累世之勤劬哉！”予友復止氏，东里世家，西昆灵裔，文裾奕奕，经笥便便，自舞象侍尊先公太初先生坛坫，气猛吞牛，才雄吐凤，翔千仞而鹜八极。是父是子，并登作者之堂。復止趋庭有间，垂帷屈首，殚力搜邳架之奇，上下数千载，赤文绿字诸灵秘，几几乎追神脉望，与古俱化。生平欣赏，独神往杜牧之其人。岁辛巳，与予问业方山别墅，不固我，出所丹铅《樊川集》，指授往复，若穆然见牧之于诗书。牧之以樊川传久矣，樊川以復止传，又宁有既乎！予椎鲁无文，即日对樊川，希少有领略。自分于復止，得髓得肤，见地迥别，乃復止于樊川以独有会也。樊川在当时，感愤风云，依光日月，清华之业，鹄起蝉联，斯亦无所不得志。顾津津思以著述寿樊川，若将并一时禽鱼花鸟，长留飞跃之趣以不朽。嗟乎，牧之而直为一禽鱼一花鸟，津津傲灵不律哉！今其集具在，若赋若诗若论著，流连沉痛，练达周详，颂之读之，樊川在焉，夫将遇之旦暮。昔贤谓李杜文章，光焰万丈，作者罕俦，辄进樊川而伯仲之，谓小杜得其雄健。予始不信，乃今知之已。反覆《罪言》、《兵论》，飒飒乎竦，荃宰之神为下，芟菟之听竟究，功归于听者，而言者之罪至今。夫言有当于用，何渠必收言者之利！实事不言，而言事不实，此则樊川之所痛心，未始引以分咎也。读《樊川集》者，作如是观，復止以为然否？昔晁补之策安南兵事，亦援樊川前著，肆为《罪言》。两贤异代，志一道同，闭门造车，出门合轨，后有作者，弗可及已。乃予不敏，若于復止，有以观其深也。丙子之役，復止挈马兔，走燕云，凭吊淋漓，多得诸垆头盾鼻。已复闻天骄犯顺，忧在至尊，则尝走当事，借筹分肉食之谋，几几乎《罪言》哉！当事者用以窥左足，戎丑为喙馘，则言之者无罪，顾不自列于功人也。牧之、补之，与我復止，鼎峙千秋矣。復止之嗜樊川，自具手眼，直会樊川苦心，并欲使知人者互（？）出其手眼，于颂读之外，缮而寿诸梓，且欲寿其尊公《太初遗

稿》，并行于世。猗嗟乎，东里家学，源濬而流为长，又安所纪极？补之为宋闻人，著述表表，前无作者。其父君成，起家新城令，博伟俊辨，苏长公与之游，不知其人；会补之以史馆都文誉，而后君成之文学赖以声施，长公以为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之报。余于復止乔梓亦云。復止《樊川集》行，不固我，属之枝骈。夫金钟大镛，自应悬之东序，愿进击瓮扣缶者，而与之鼓吹休明，谓不知量何。虽然，予之知復止，未始非復止之知樊川也。余更怵然于东里代起之有家学。予于七书三篋，未见一班，映雪瞻（？）云，此际不禁怆悦也。崇祯壬午楔日同邑社弟张巽申洁修题。

从上面所录的张序，特别是序中“出所丹铅《樊川集》”、“缮而寿诸梓”、“復止《樊川集》行”诸语来看，郑氏不仅收藏有《樊川文集》，而且刊印过《樊川文集》。不过郑氏印行的《樊川文集》是否就是昭质堂本，或者昭质堂主人就是郑氏，序中并未明言，但这种可能是有的。

若再从书中的凡例和评语来进一步推测，昭质堂主人可能就是郑氏。昭质堂本在张序后有署名“昭质主人”的凡例数则，“评鹭”一则曰：“切要则片言不易，尚华则繁词堪厌，是以但为质言，不溢骈词。记室评诗，彦和论文，意有在矣。”可见书中有昭质主人的评语。而张巽申的序已称该书为“郑復止评樊川集”，而且该书本集卷一、卷二十一外集中均用黑体字标有“明 兰陵郑邨復止甫评”的字样。而该书在出现郑氏评语的地方，都未注明哪些评语是郑邨（復止）的，哪些属于昭质主人的。这很难说是昭质主人的疏忽所致，更大的可能则是昭质主人与郑邨（復止）是同一人，所以他用不着在出现评语的地方，作出昭质主人与自己的区分。当然，这些仅是笔者目前从本子中找到的线索而作出的初步推测，尚无直接的证据。

从评语中我们只知道郑邨字復止，明代兰陵（今常州武进）人，与作序的张巽申（洁修）是“同邑社”。另据张序可知其在崇祯丙子（1636）前后曾在军中任职。至于郑氏其他生平事迹，需要从其他的途径查考。前引张序提到郑邨的父亲为郑太初，查《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中知有明人郑振先字太初，常州武进人^①，而常州府武进县在历史上一度被称作“兰陵”，这既与张序中提到的郑邨父亲“太初先生”相合，也与书中郑邨所署的籍贯（古称）切合，我们初步推断此郑振先（太初）与郑邨当为父子关系。另据[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21《人物·宦绩》知郑振先有子郑鄮，又据《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知，郑鄮字谦止，号垞阳^②。这样看来，郑邨、郑鄮二人的名，都与古郑国的地名有关，切合其郑姓，且部首相同，又表明彼此辈分相同；二人的字则都带“止”字，且

①《江南通志》载其字明初，误；《浙江通志》引《嘉兴县志》载其字太初，武进人；《礼部志稿》亦有类似记载。

②《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载：“郑鄮字垞阳。”误。《御选明诗》载：“郑鄮字谦止。”《通雅》亦载：“渊明诗：‘乃在垞山阳。’郑鄮取以为号。”

“谦”、“復”都与《周易》六十四卦有关。这说明郑邴(復止)与郑鄮(谦止)应是兄弟辈分。郑鄮现存《荃阳草堂文集》16卷^①,卷14《亡考彖斋府君行状》曰:“府君(按,指郑父振先)遂弃诸孤逝矣。诸孤五人,鄮不孝,居长。”并提到继母“吴安人生弟邴,邴与诸子无二”。又同卷《亡妣吴安人行状》中有类似的记载:“府君有七男四长:鄮……次邴…次邴,聘江都教谕……次郾……”这说明郑鄮与郑邴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其中郑鄮为兄,郑邴为弟。

郑振先、郑鄮父子身处党争激烈、外患频仍的明代中后期,在仕途上颇受挫折(郑振先、郑鄮父子事迹,《东林列传》均有记载)。万历年间,郑振先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措辞严厉,矛头直指当权者,并由此被贬官,最终闲居老家至死;郑鄮陷入党争更深,天启年间曾被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崇祯时竟以疑狱磔死^②。这种时代和家庭背景,对郑邴的心理刺激很大,这在《樊川文集》中郑邴所作的评语里面亦能找到一些痕迹。如其评《李甘诗》:“小人陷害君子,唯有‘党’字可惑君听。古之清流受祸必惨,深堪叹息。”虽是为“古之清流”而发,但也是目睹明代党争特别是身处明季党争环境中的有感之言,特别是郑振先、郑鄮父子亦以清流自居,却深深卷入党争的家庭背景,更使得郑邴读杜牧的《李甘诗》有特殊的感受。又郑振先、郑鄮家族出于元明两代受到朝廷旌表的金华府浦江县“义门郑氏”,所以家族中的儒学思想比较浓厚,而在明代中后期的儒学主要体现为心学,郑鄮本人在狱中作《荃阳草堂说书》授其子,皆提倡心学之谈。这种家学渊源和时代哲学,在郑邴为杜牧诗文所作的评语中也能得到印证。如评《长安送友人游湖南》“相舍器饶中,吾过何由鲜”二句为“道言”,评《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且免材为累”句为“静者之言”,评《投知己书》为“温和而介,不作牢骚语,类有道者言”,评《上周相公书》曰:“大儒未有不知兵,如阳明先生不愧此语。今膺督抚之任者,宜诵此。”阳明先生正是明代中期著名的哲学家,其所提倡的心学思想影响士林很深,郑氏家族亦不能免。郑鄮工诗擅文,亦爱戏曲,曾著有《论语笔解》、《禹贡注》、《宋三大臣汇志》二十一卷、《荃阳草堂说书》七卷、《考定苏文忠公年谱》一卷,还评点过《宋丞相韩忠献公家传》十二卷,可见郑氏为诗书之家。在父、兄的影响下,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郑邴刊行和评点《樊川文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昭质本的文献价值

昭质堂本《樊川文集》的文献价值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许多与通行本不同的文字,可供校勘之用。胡可先《点校本〈樊川文集〉酌议》(收入其专著《杜牧研究丛稿》,以下简称胡著)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①民国21年活字本。

^②参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九“郑谦止始末”。

本加以对照,指出通行本《樊川文集》在点校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四库本《樊川文集》自身存在问题,一是不全^①,二是有篡改^②,因而参考价值不大。同时,胡可先没有参校昭质堂本和朝鲜夹注本,所以在指出点校本《樊川文集》错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有些校勘则需要更多的版本支持。而昭质堂本以及朝鲜夹注本,在文字上与通行本颇有差异,今列出部分异文,以供阅读胡著和通行本参考。

通行本卷一《张好好诗》:“一声雏凤呼。”胡著引杜牧手迹作“离凤”。按,昭质堂本、朝鲜夹注本、明翻宋刊本(即通行本的底本)均作“离凤”,作“离凤”当是。通行本据冯注本《樊川诗集》和《全唐诗》将“离凤”改作“雏凤”,不妥。昭质堂本、朝鲜夹注本、明翻宋刊本,在时间上均比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和《全唐诗》要早,在版本上也更为可靠,而《樊川诗集注》和《全唐诗》中的“雏凤”一词,并无版本上的依据,很可能因“離”、“雛”二字形近而臆改致误。

卷二《街西长句》:“游骑偶同人斗酒,名园相倚杏交花。”胡著参校《才调集》,认为“偶同”应作“偶逢”,“游骑同人斗酒,似不可通。”按,昭质堂本仍作“偶同”,不误。所谓“偶同”,并非是“游骑同人斗酒”,而是人之间的斗酒,“游骑”一词实际上是代指骑马的人,句意为“骑马一同出游,互相斗酒”。

卷三《赠李秀才是上公孙子》。按,诗题不通,昭质堂本“是”作“呈”,是。通行本与胡著均未校。

卷四《为人题赠二首》:“我乏青云称。”胡著参校《才调集》“青云”作“凌云”。按,昭质堂本亦作“凌云”,可参。又同诗:“月落珠帘卷。”胡著参校《才调集》“月落”作“日落”,昭质堂本亦作“日落”,可参。又同诗:“筠笼语翠襟。”胡著参校《才调集》“襟”作“禽”,昭质堂本亦作“禽”,可参。

外集《奉和仆射相公春泽稍愆圣君轸虑嘉雪忽降品汇昭俗即事书成四韵》。按,题目中的“即事书成”疑有误,昭质堂本与朝鲜夹注本“成”均作“怀”,可参。通行本与胡著均未校。

以上主要是结合通行本的点校与胡可先的补校而列出的一些异文,实际

①文渊阁四库本《樊川文集》只有17卷,乃将20卷中诗歌部分和外集、别集等专门辑录诗歌的部分去掉,仅存赋和文,而文中也有一篇缺失。不过,这些内容在文津阁四库本《樊川文集》中均存在。

②如通行本卷六《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天不生夫子于中国,中国当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库本作“天不生夫子于春秋,后世当何如?曰不春秋如也。”又同文:“彼夷狄者,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不夷狄如也。”库本作“处后世者,弑父弑君,奚啻倍于春秋,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春秋如也。”按,此处库本将“夷狄”改作“春秋”,是为了不触犯清统治者的忌讳而擅自改动的文字,并无版本上的依据,因此这段文字参校价值不大。昭质堂本此处文字与通行本同,可见通行本不误,库本则是妄改。

上,昭质堂本《樊川文集》还有许多异文不乏参考价值,本文在此只是列举一二,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该本的重视。

除了以上列举的异文外,该本还有郑邠的评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张序可知,郑復止喜欢藏书,且对樊川文集别有会心。特别是郑氏身处明季,遭逢“丙子之役”、“天骄犯顺”等重大事变,对现实非常关注,因而在阅读杜牧诗文时,常常能结合其时代形势发表感慨。如:

评《晚晴赋》“冠剑大臣,国有急难,庭立而议”数句:“有深讽。”

评《故洛阳城有感》“铜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二句:“感慨淋漓。”

评《灞陵骆处士墓志铭》:“善刀而藏,处衰世之良法。”

评《荐韩义启》:“年来蝗旱,炊粒如珠,儒流支生无策,御史固救饥寒官。不自求而为知友求,足深古处。”

评《朱载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令张公及除猷陵令韦幼章除京兆府仓曹等制》:“于守令谆谆告诫,想见爱民切至。今日所宜申命。”

所谓“年来”、“今日”、“衰世”等评语,都离不开明季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从“深讽”、“感慨”等用语中,我们不仅能看出郑氏的时代背景,也能由此深刻领会杜牧诗文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除了注重杜牧诗文的现实性、政治性外,郑氏对杜牧诗文的风格多样性也很注意加以点评,体现出相当的艺术感受力,如对两篇赋的独特风格有这样的评论:

纯用议论,深其寄托,殆渊明所云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欤?

(评《阿房宫赋》)

襟期高旷,古今第一流。(评《望故园赋》)

又如评文,也很注意揭示不同作品的独特风格:

指陈慷慨,激切惻然,忠爱深于痛哭,非若贾生空堕一副急泪。(评《罪言》)

至论,非奇论。(评《论相》)

指画详明,伏波聚米时也。(评《上司徒李相公论用兵书》)

顿放曲折,若云烟自为卷舒。(评《上昭义刘司徒书》)

文情层叠而清遥,春浪秋云殆其似之。(评《上宣州高大夫书》)

筹时苦心,衽弘血迸纸矣。(评《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

事亦怪诞堪志。(评《进士龚绍墓志铭》)

又如评诗,对杜诗风格的多样性亦颇留意:

娟妍之致,和笔墨流出。(评《张好好诗》)

气豪而语壮。(评《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

媚丽而情至,应是风流第一。(评《为人题赠》其二)

明月万山,方是美人境界,不落寻常俗艳。(评《有寄》)

怅恨无极。(评《泊秦淮》)

清响裂云。(评《寄扬州韩绰判官》)

低徊百倍。(评《金谷园》)

在揭示杜牧诗文风格多样性的同时,郑氏特别注意到杜牧诗歌在写景艺术上的多样性,如:

如石间水响,天然清亮。(评《题池州弄水亭》)

清朴。(评《赠宣州元处士》)

闲适。(评《春末题池州弄水亭》)

盈盈澹致。(评《题扬州禅智寺》)

冲寂自妍。(评《忆齐安郡》)

烟景迷离,足萦怀抱。(评《朱坡》)

意境幽折。(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萧疏。(评《齐安郡中偶题》其二)

此外,对杜牧诗文的源流亦有深刻的抉发,如评诗《昔事文皇帝》:“杜少陵于感事诗独有讽刺之妙,樊川亦复不减。”评诗《题桐叶》:“妙处直逼高岑。”又如评《燕将录》一文:“用折、用变处,神似龙门。”评《黄州刺史谢上表》:“以文通之芳蕤,发敬輿之割挚。”另如评《偶游石盎僧舍》诗中“风绪和无力”句:“五字绝妙,真词料。”

这些评语都不失为郑氏的心得,有其精当之处。而早年出版的《唐诗汇评》和近来出版的《杜牧研究资料汇编》均未收录,甚为遗憾,故笔者在此移录较多,以供学界同仁借鉴。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